

【外交关系】

# “全球南方”的兴起、分化与中国的选择

杨 慧

**【摘要】**作为一种结构性集体身份，“全球南方”的含义随着二战以来南北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并相继被注入了“殖民反抗者”“经济落后者”和“大国博弈中立者”等内涵。其兴起并不是南方国家之间协调一致、联合行动的产物，而是单个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行为叠加的结果。“全球南方”的分化与“全球南方”的兴起相伴而生，表现为南北发展鸿沟、技术鸿沟和数字鸿沟的持续拉大，在应对挑战和危机时更显著的脆弱性，以及基于个体差异、西方诱拉和领导权竞争所导致的内部分化。“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分化使其成为国际权力秩序重塑的“关键平衡者”，导致全球性制度秩序向地区性制度秩序退化，加速国际规范秩序松动，从而推动国际秩序的多极化进程。中国作为最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应着力支持和引导南方国家的知识资源生产，坚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促进“全球南方”合作机制高质量发展，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

**【关键词】**全球南方；南北关系；国际秩序；大国博弈；发展中国家

**【作者简介】**杨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24.2.1～23

**【基金项目】**本文是2023年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最终成果（项目编号：2023QN061）。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演进、世界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显著增多的当下，“全球南方”正成为理解世界之变的关键词之一。2023年1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发文称，2023年全球政治中一个最具意义但却被忽视的趋势就是“全球南方”正在各个领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sup>①</sup>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表示，“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对日本而言是重要的机遇和挑战”。<sup>②</sup>2024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7届非洲联盟峰会召开时指出，“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全球南方’蓬勃发展，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sup>③</sup>同月发布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也显示，G7国家的多数民众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和其他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将会更加强大，而西方国家将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落。<sup>④</sup>在这个日渐“分裂”的世界中，国际社会竟在短时间就对“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达成了共识，着实令人惊讶。

反观“全球南方”自身，似乎不足以对这种高关注度做出解释。这一被认为已经具有全球战略影响的力量，不仅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也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更没有一致的议程或纲领，而仅仅是一组被认为具有共性的国家群体。这个群体在面对重塑国际秩序的大国博弈和以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为代表的新一轮国际安全危机时，因坚持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而使其战略价值备受瞩目。2023年7月，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指出，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明确了“全球南方”在政策意义上的内涵和定位。<sup>⑤</sup>那么，如何在学理上理解“全球南方”这一尚缺乏明确定义的国家群体？“全球南方”因何兴起？这种兴起是一时的还是长久的？将对当下和未来的国际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如何定位与“全球南方”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

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全球南方”，更为透过“全球南方”的棱镜观察更宏大的国际秩序走向，以及中国在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重塑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为此，本文拟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首先，聚焦如何理解和认识“全球南方”，梳理“全球南方”兴起的历史进程；其次，分析“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中日趋分化的现状和前景；再次，从宏观维度分析“全球南方”的兴起和分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最后，探讨中国如何以“全球南方”为参照，锚定自身的国际身份定位，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

### 一、“全球南方”的兴起

“全球南方”是一个随着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不断演化的概念。从词源上来看，“南方”和“全球南方”的起源都具有反剥削的政治内涵。“南方”源于对解决国内地区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思考。早在1926年，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其文章《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就深入探讨了意大利工业化的北方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之间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赋予“南方”这一地理词汇以政治内涵。<sup>⑥</sup>“全球南方”的提出则是着眼于不平等的国际权力结构。1969年，美国作家和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较早使用了“全球南方”一词。他认为越南战争是北方统治全球南方的历史顶峰，“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汇聚在一起，产生了一个不可容忍的社会秩序。”<sup>⑦</sup>与“南方”代指受剥削、压迫和歧视的地区相类似，“全球南方”指代那些处于被“管理”、被“领导”状态下的结构性中下层国家。<sup>⑧</sup>

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南方国家开始受到关注始于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进程，这一集体身份析出了北方/西方与南方之间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结构。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广大地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

统治与从属、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sup>⑨</sup>二战后，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去殖民化运动兴起，一大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开始摆脱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决和政治主权，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在这一意义上，南北关系就是战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战后演变下来的一部分。<sup>⑩</sup>因此，南方国家最初的兴起带有一种关系属性，与其说南方国家是一个国家集合体，不如说是一种抵抗符号，代表着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力量。

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以及77国集团的成立，是这一时期南方国家走向政治自觉的标志，也使南北之间压迫与反抗的结构关系具象化。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强调各国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呼吁亚非国家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以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正式走上世界舞台。1961年9月，由埃及、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富汗五国发起的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共有25个国家的首脑参加会议并通过了《不结盟运动宣言》，确立了独立、自主、不结盟、非集团的基本原则和宗旨，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1964年12月，77国集团在首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期间成立，77个发展中国家发表了《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提出了关于国际经济关系、贸易与发展的一整套主张。截至2024年1月，77国集团已有133个成员，是南方国家改善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利地位、争取政治经济权益的集体组织形态。

20世纪80年代，随着南北关系从政治对立转向

经济依存与合作,南方国家逐渐成为这一关系结构中“经济落后”的代表。1980年和1983年,由官方人士组成的非官方学术机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又称“南北委员会”)相继发布了《北方—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和《共同的危机:南北合作争取世界经济复苏》两份报告。<sup>①</sup>报告分析了南方的困境和南北间的差距,提出了划分南北的虚拟分界线,即以北纬30度为基准,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非洲北部和中东一直向北穿过中国和蒙古,但向南倾斜(即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国)。该线以北的国家被认为是发达的北方国家,包括北美、西北欧和日本等富裕地区,以及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南的国家多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该线以明晰可见的方式展现了当时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由于报告由联邦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主持,该线也被称为“勃兰特线”。尽管“勃兰特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调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和不平衡,呼吁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与援助以缩小这种差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勃兰特线”逐渐成为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象征,反而加深了国际社会关于北方国家先进、南方国家落后,北方国家富裕、南方国家贫穷,北方国家在中心、南方国家处于边缘的印象。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南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附属东西问题的。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下,北方对南方的发展援助之所以成为南北关系的主线,背后具有战略资源争夺的考量。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优势,美国和苏联都需要扩大自己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其在南北关系上的政策受到总体战略环境的制约。在这个背景下,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援助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这种发展援助起初针对的是战后重建需要援助的国家,冷战使这种发展援助的主要目标变成在“待发展”的国家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sup>②</sup>正如第三世界所批评的,美国只知道“透过东西方关系的棱镜”看待南北关系,全然不把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贫

穷国家的困境放在心上。<sup>③</sup>由此可见,冷战时期南方国家受到的关注和影响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国竞争的产物。

随着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东西问题落幕,南北问题被裹挟进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南方”逐渐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描述南方国家的流行术语。冷战后的世界不再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界,各国都被整合进一体化的经济系统中。随着南方国家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南方”一词更常被冠以“全球”的前缀。以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为标志性事件,南方委员会将原来的南方国家推入全球治理框架,“第三世界”的概念日渐被“全球南方”正式取代。<sup>④</sup>2004年,“全球南方”一词仅出现在19份人文社科出版物中,但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增至248。<sup>⑤</sup>“全球”作为“南方”的附加限定词有两种含义。一是将“北方”和“南方”、富人和穷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这些问题的相互关联。<sup>⑥</sup>有学者指出,“全球”一词的加入清楚地表明,这不是对世界的地理分类,而是基于经济不平等的分类,而经济不平等恰好有地理上的一致性。<sup>⑦</sup>二是从全球的视角观察南方作为一个国家集体身份的共性。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报告指出,“全球南方”一词并不暗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相似的,可以被归为同一类别,而是强调尽管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属性上各不相同,但都面临一系列的脆弱性和挑战。<sup>⑧</sup>

部分南方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改变这一群体在国际社会中贫穷、落后的形象,推动了南北关系在经济权势方面的调整。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开始崛起,不仅推动了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也提升了“全球南方”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相对应,西方国家的实力则出现了相对

衰落的迹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报告显示,从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从14.4%上升到42%,占世界进口的份额从14.1%增加到38.9%,仅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翻了一番。<sup>①</su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G7国家在世界GDP中的份额自1991年开始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1991年G7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为49.76%,到2010年降至34.24%,2023年再降至29.92%。<sup>②</sup>2007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第一次超过发达国家,达到50.04%。预计到2028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将达到61.49%,发达国家占比则为38.51%。南北经济长期以来“四六开”的格局将变为“六四开”。<sup>③</sup>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亚非拉地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关于新兴市场和崛起大国的讨论所勾勒出的多极化世界格局,与南方国家的经济崛起密不可分。

在全球经济“南升北降”的背景下,“全球南方”表现出在经济基础支撑之上的“政治觉醒”。2022年2月俄乌冲突发生后,“全球南方”没有选择支持欧美的立场。2022年3月,联合国大会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就乌克兰等国提出的题为“对乌克兰的侵略”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有40个国家表示弃权或反对,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古巴、哈萨克斯坦等主要“全球南方”国家,涵盖了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同年4月,联合国大会就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进行投票,反对或弃权的国家增加到82个,其中不乏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尼日利亚等。2023年2月,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联合国大会再次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特别紧急会议。乌克兰等57国提出了“和平公式”决议草案,呼吁立即停火,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但包括印度、南非、越南等在内的主要“全球南方”国家都没有支

持西方的立场。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爆发冲突后,“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呼吁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外交手段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与西方国家全面声援以色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立场再次凸显了“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的立场分歧。在中美围绕贸易和技术展开战略博弈,特别是关于5G的竞争中,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不顾美国的偏好甚至压力,采用中国的技术和产品,其中包括巴西、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等在西方看来重要的“中间国家”。<sup>④</sup>总之,大国博弈愈发激烈,使南北关系再次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冲击,“全球南方”作为“中间地带”的战略价值迅速上升。南方国家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成为本轮“全球南方”兴起的新近表现。

梳理“全球南方”的兴起历程不难发现,“全球南方”在本质上是对一种结构性集体身份的描述,南方是相对于北方或西方而存在的,其含义随着南北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演化。20世纪50-60年代,南北关系的主题是去殖民化,南方国家代表了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之后,南北关系转向发展援助,南方国家意味着落后、贫穷和边缘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方国家深度融入全球化浪潮带动了南北关系转变,南方国家的经济崛起塑造了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南方的兴起则是在大国战略博弈框架下的南北关系调整中浮现的。大国博弈使中间地带凸现,南方国家拒绝选边站队等一系列战略自主的表现,被认为是“政治觉醒”的标志,推动“全球南方”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一支全球战略力量。

“全球南方”兴起的历程也揭示了“全球南方”始终没有明确定义的原因所在。“全球南方”的兴起并非严格的机制化和组织化的行为,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全球南方”不是一种政治构想,或者说至少不是“南方”人民的一种政治构想。<sup>⑤</sup>因此,“全球南方”的兴起并不是南方国家联合一致、协调行动的

产物,而是单个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行为叠加的结果。甚至“全球南方”兴起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北方和西方国家的关注与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国际政治权力博弈转向“全球南方”国家,延续的仍然是“全球北方”大国的现实主义逻辑。<sup>①</sup>一方面,正是北方/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争取和拉拢,强化了“全球南方”的集体认同,推动了“全球南方”的兴起。另一方面,北方/西方大国加强对“全球南方”的关注,将“全球南方”视作战略资源,并且根据“全球南方”的行为校正自己的大国博弈策略,又成为“全球南方”兴起的重要表现。

## 二、“全球南方”的分化

在“全球南方”兴起的进程中,“全球南方”的分化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全球南方”的分化既指“全球南方”与北方国家的分化,也包括南方国家内部的分化。事实上,“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全球南方”的分化是一个相伴而生的过程,其根源在于南北问题的本质是发展不均衡。一方面,“全球南方”是在与北方国家的分化中兴起的。正是与北方国家在历史记忆、经济水平、发展诉求等方面的差异,塑造了南方国家的集体认同,使“全球南方”得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身份标签而存在。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兴起又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南方”的分化。随着南方国家在经济发展、政治影响等方面的崛起,南方国家逐渐意识到自身相对于北方的独特性和一致性,开始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和话语权,使南北之间以及南南之间的差异更加突出。

“全球南方”的分化首先表现为南北鸿沟持续拉大,突出体现在发展鸿沟、技术鸿沟和数字鸿沟三个方面。在“勃兰特线”提出40周年之际,有学者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平等、经济实力和政治满意度方面对南北鸿沟进行了系统评估,发现“勃兰特线”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虽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部分南方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南北之间的发展鸿沟并没有消除,甚至还在增大。从各国的人均

实际收入水平来看,1980年至2016年间,77国集团国家平均增长了66%,但经合组织国家则增长了114%,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的收入差从12714美元增长到30903美元。<sup>②</sup>2023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版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报告指出,在该指数所覆盖的110个国家和61亿人口中,有11亿人生活在严重的多维贫困中,其中有5/6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5.34亿人)和南亚(3.89亿人)。<sup>③</sup>世界银行预计,到2024年底,大约2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大约40%的低收入国家人口将比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更加贫困。<sup>④</sup>

在技术鸿沟方面,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智能和互联生产系统,有望提高生产率并减少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但南方国家却面临错过这场技术革命的风险。当发达经济体已经在相关技术上领先、逐步淘汰老一代网络、采用5G等先进技术时,低收入国家仍在沿用2G和3G网络,最不发达国家仍在努力追赶第一、二代技术。高昂的基础设施成本、设备价格、电力供应不稳以及监管和采用限制都减缓了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使南北技术鸿沟持续拉大。为了评估各国公平使用、采纳和调整前沿技术的能力,联合国贸发会议推出“前沿技术准备指数”作为评估指标,该指数涵盖信通技术、技能、研发、产业能力和资金等具体指标。2023年发布的最新指数显示,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其信通技术连接和技能指标排名较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所有指标中的排名都低于100,在信通技术基础设施和研发方面尤为薄弱。<sup>⑤</sup>

在数字鸿沟方面,南北之间在数据资源、数据技术和数据应用方面的差距,加大了彼此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不平等。2023年11月,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目前有54亿人使用互联网,相当于全球人口的67%。在欧洲、独联

体国家和美洲,大约90%的人口使用互联网。阿拉伯国家和亚太地区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占比约为2/3,与全球平均水平一致。然而,在非洲这一数据仅为37%。<sup>②</sup>虽然以数字方式提供的服务已占全球服务贸易近2/3,但在世界一些地区,民众仍无力负担网络接入的高昂费用。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一部智能手机的费用占平均月收入的40%以上,非洲用户支付的移动数据费用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sup>③</sup>由此可见,近年来全球互联网连接的发展并不均衡,越来越多低收入国家被抛在后面,数字鸿沟正在拉大。

“全球南方”分化的第二个突出表现是南方国家在应对各种挑战和危机时呈现更显著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南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相对滞后,限制了其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二是当前国际秩序中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以及在资源分配和环境问题上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南方国家的脆弱性。正如印度总理莫迪所言,大多数全球挑战并非由“全球南方”创造,但对南方国家的影响更大。<sup>④</sup>西方国家也在2023年的《慕尼黑安全报告》中坦言,“俄乌冲突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其导致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对‘全球南方’国家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损害。”<sup>⑤</sup>

具体而言,在债务风险方面,世界银行发布数据指出,受利率上升影响,2022年发展中国家用于偿还政府和政府担保债务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4435亿美元,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偿债支出(包括本金和利息)比上一年增加了5%。前所未有的债务水平和高利率使许多国家陷入债务困境。仅过去三年,就有10个国家发生了18起主权违约,超出此前20年的总和。当下约60%的低收入国家有极高风险陷入或已陷入债务困境。<sup>⑥</sup>在粮食安全方面,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延宕反复,气候变化冲击和俄乌冲突等动荡频发,使西亚、非洲、加勒比等地区的南方国家陷入粮食危

机。2023年7月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按照食物不足发生率衡量,2021-2022年间全球饥饿状况基本维持不变,但仍远高于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水平。2022年全球约有9.2%的人口受饥饿影响,高于2019年的7.9%。其中,非洲大陆首当其冲,每五人中就有一人面临饥饿,饥饿人口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预计2030年将有近6亿人长期食物不足,比没有发生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情景下多出约1.19亿人,比仅仅不发生俄乌冲突的情景下多出约2300万人。<sup>⑦</sup>在气候变化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通常位于地理上的低洼地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如2022年6-10月,巴基斯坦遭遇严重洪灾,三分之一土地被淹,约1700多人死亡、1.3万人受伤,800万人流离失所,3300万人受到影响。<sup>⑧</sup>小岛屿国家则面临海平面上升和海岸线侵蚀的严重威胁。全球变暖导致冰川融化和海洋热膨胀,海平面正以每年约2毫米的速度上升。这对于低海拔的小岛屿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淡水资源减少、渔业资源受损,还会致使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总之,2020年以来一系列危机对南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国家经济社会状况陷入混乱,足见南方国家比北方国家存在更大的脆弱性。

“全球南方”分化的第三个表现是南方国家内部的分化。这种分化既有其本身的客观基础,也与外部力量的挑拨和拉拢有关。与各类国际组织和政治集团不同,作为一种结构性身份兴起的“全球南方”并没有共同的政治制度、利益基础或宗教文化认同。“全球南方”涵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一事实,既意味着团结一致可能带来的巨大能量,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传统、地理资源禀赋和国情体制等带来的巨大差异。<sup>⑨</sup>仅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这个群体既包括中国、巴西、南非、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也包括联合国认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最不发达国家,这种差异意味着“全球南方”

在凝聚政策共识方面将困难重重。在学术研究中，“全球南方”能否作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元类别”对全球空间进行分类也存有争议。<sup>⑤</sup>总之，“全球南方”的内部差异使其保持一致性和协同性面临复杂的挑战。

部分国家利用“全球南方”内部的差异对南方国家分别进行排斥和拉拢，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南方”内部分化的风险。如前文所述，本轮“全球南方”的兴起带有鲜明的大国博弈色彩。由于“全球南方”包含的国家众多，对美国而言，在国际投票中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美国竭力避免对“全球南方”做出一般性回应。<sup>⑥</sup>不仅如此，部分国家还试图将这一概念作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抓手。例如，日本炮制“中国例外论”，声称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不属于“全球南方”，并且频繁鼓噪“中国债务陷阱论”等反华谬论，挑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sup>⑦</sup>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和巴西在贸易、政治战略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关系进行评估，得出双边关系失衡将影响两国合作、中国和巴西必然是竞争对手的结论，干扰“全球南方”内部的团结。<sup>⑧</sup>

此外，“全球南方”内部的领导权竞争是另一个可能导致“全球南方”分化的潜在风险。部分区域大国尝试以“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为契机扩展自身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印度及时抢抓这个概念，2023年1月和11月两次举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试图借此整合南方国家的意愿和诉求，主导“全球南方”事务话语权。巴西希望重振南方国家共同市场，引领“全球南方”合作，于2023年5月时隔十年主办南美国家领导人会议，与会各国就如何加强区域合作、推进南美一体化交换意见，并签署《巴西利亚共识》。总之，“新兴国家是小国中的大国”这一观点是当代国际关系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假设，印度、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国都是其所在地区的“大国”。它们影响国际秩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辩论，

试图弱化以往的“南方国家”身份，更想充当“南方/北方”的桥梁以整合南北之间的政策空间。<sup>⑨</sup>借助“全球南方”兴起提升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相关国家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无意识的竞争可能导致结构性的领导权争夺，加剧“全球南方”的分化趋势。

### 三、“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

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深刻转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推动国际格局调整，动摇了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础，加速了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2017年以来，随着中美博弈渐趋白热化，国际秩序转型嵌入“大国战略竞争”的框架，阵营划界促使小多边机制兴起，冲击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体系架构。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危机事件突发，进一步加深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裂痕，也集中暴露出这一秩序的深层次危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决定国际秩序内核的要素之争浮现。权力、制度、规范是构成国际秩序的三大支柱，当其中两者乃至三者从根本上受到挑战并最终发生变化时，将发生重大的秩序过渡。<sup>⑩</sup>以上三个阶段的秩序转型进程，分别在权力、制度、规范三个维度使现有国际秩序出现松动，正将国际秩序推向全面的变革和重塑。正如德国总理朔尔茨2023年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世界正面临一个时代的转变：一个划时代的构造转变”。<sup>⑪</sup>

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作为一种结构性身份的再现，将不仅推动南北关系的调整，同时也是决定国际秩序转型方向的关键力量。需要明确的是，“全球南方”兴起的国际秩序意义并不在于这一群体已经成长为国际秩序中的一极，能够独立制定和推行国际政治经济议程。作为仅仅具有相似结构性身份的国家群体，“全球南方”作用的发挥，需要通过影响大国战略博弈来实现。这是因为国际秩序的未来主要仍是由大国战略竞争塑造的，但是“全球南方”的兴起，使大国战略博弈从双方的竞争对抗转向更

广阔的第三方空间。换言之,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可以充当某种第三方——类似于全球观众——的角色,从而发挥影响力,帮助塑造关于世界政治中什么是正确且可接受的全球叙事。<sup>④</sup>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访美演讲中指出,“无论我们相信自己的道路多么正确,如果被在国际社会中占据重要比重的南方世界所背弃,我们就会成为少数派,诸多政策课题也很难得以解决。”<sup>⑤</sup>如果说大国博弈的目标是争做未来国际秩序的“领导者”,那么“全球南方”则是决定哪种秩序能够最终形成的“追随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南方”成为影响大国权势竞争和国际秩序走向的战略力量。具体而言,“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权力秩序方面,随着大国战略博弈场域迅速向“全球南方”延伸,“全球南方”从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关键平衡者”,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

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大国迅速加强对“全球南方”的资源投入和利益捆绑,强化对南方事务的控制,“全球南方”被深度嵌入国际权力竞争和利益争夺的复杂网络中。近年来“全球南方”战略影响力的增强,也迅速被大国博弈所捕捉,部分西方国家意识到“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塑造的潜在作用,对其展开争夺和拉拢。回顾中美战略博弈的进程不难发现,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不仅体现在从经贸、科技领域到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化,同时也伴随着地缘空间上的不断延展。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战略博弈主要局限于双边范围的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在中国周边围绕领土主权的摩擦。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以西式民主自由价值观为纽带,拉拢盟友和伙伴国打造排华“小圈子”,将欧洲国家绑到美国的战车上,使大国战略博弈从双边对抗向外部延伸,甚至打上了文明竞争的烙印。而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更具有深远的“全球南方”意义。这一战略构

想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亚太”地区向更广泛的“印太”地区延伸,将印度、东南亚等国家整合到美国的战略布局之中,甚至辐射到非洲、拉美等地区,以形成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联盟,平衡和制约中国的影响力。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也都顺势积极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关系。2023年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先后访问了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家。同年4月至5月,岸田文雄先后访问埃及、加纳、肯尼亚和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这是日本首相时隔7年再次访问非洲多国。2023年7月,欧盟与33个拉美地区国家举行了8年来的首次欧盟—拉共体峰会。

在大国的裹挟下,“全球南方”被迅速推上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从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开始转变为新国际秩序构建的“关键平衡者”,在国际议程设置方面话语权也有了显著提升。二战后,西方大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主导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在这一时期缺乏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力,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其利益关切和诉求也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然而,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西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在西方国家的“邀请”下,“全球南方”迅速从“台下”走到“台上”,成为新秩序构建的参与者,这在2023年的全球多边机制中多有体现。2023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邀请巴西、菲律宾、加纳、阿塞拜疆、纳米比亚等众多“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参加。同年5月G7峰会则邀请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东盟轮值主席国)、科摩罗联盟(非盟轮值主席国)等南方国家与会。同年9月G20新德里峰会给予非盟正式、永久成员地位。这是G20机制成立20多年来首次扩员。非盟成为G20成员中继南非之后的第二个非洲成员,继欧盟之后的第二个区域组织成员。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回应。2023年慕尼黑安全会议设置了“碎片世界中的南北对话”“重新定位南北合作”等专场讨论,强调西方需要争

取“全球南方”的支持与合作。同年9月联合国大会在议程安排上着眼于“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讨论气候变化、主权债务减免,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实现联合国在繁荣、健康、发展、教育、性别平等方面的发展目标等议题。对此,欧盟驻联合国大使称,“如果由我们决定,那么我们会花更多时间讨论乌克兰问题”,言下之意是议程设置迎合了南方国家的需求。同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正式批准了“损失与损害”基金协议,促使发达国家向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支持。总之,国际舞台上的一系列变化表明,“全球南方”正逐渐成为塑造国际权力秩序的新生力量。

第二,在制度秩序方面,“全球南方”的兴起和分化推动全球性制度秩序向地区性制度秩序退化,国际秩序碎片化趋势更加突出。

近年来,全球层面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性问题不断积累,全球性制度秩序日益呈现紊乱态势。二战以来,美国主导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体系。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构成了这一制度架构的核心支柱,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规范国际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制度秩序也因依赖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优势和制度霸权而存在固有的脆弱性。一旦主导国的国家实力或政治意愿发生变化,整个秩序都可能受到冲击。随着国际权力格局迅速调整,这些组织和机制在权力分配等方面难以适应变化的新现实,制度改革虽屡被提及但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面临失灵和边缘化的风险。联合国安理会面对俄乌冲突难以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受到阻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都反映了全球性制度秩序退化的现实。

全球性制度的失灵使各国维护地区安全、促进经贸合作的诉求下沉到地区层面,为地区性制度的

发展提供了空间。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中不乏地区性大国,随着南方国家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它们开始更积极地寻求符合自身利益和需求的制度安排。它们不再完全受限于全球性的制度框架,而是更多地立足于地区性的合作与整合。这些地区性制度更加贴近地区的实际需求,能够更好地应对地区内的挑战和问题。同时,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全球性机制在某些方面的失灵,为地区治理提供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随着大国博弈加剧、多重国际危机集中爆发,国际经济发展的安全化趋势愈发突出,一些国家政府出台政策要求企业缩短供应链,将供应链重新带回本国或本地区,以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提高供应链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和“供应链回流”成为当前全球贸易和供应链领域出现的新趋势。供应链的区域化,带动地区经济秩序的区域化,要求建立与之适配的政治安全秩序作为保障,又进一步刺激了地区国家间在政治、安全、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共同构建和维护一个稳定、安全的地区环境。因此,地区性制度秩序的发展,实际上是对全球性制度秩序的一种有益补充或替代。

在拉美、中亚、亚太等地区,地区性制度秩序都在加速构建,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拉美,巴西正致力于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在2023年5月召开的南美领导人会议上,南美12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就地区合作与推进南美一体化进程进行沟通,卢拉提出重启南美洲国家联盟建设、设计“南美一体化路线图”、建立高级别政治讨论机制等,以建立一个“强大、自信和政治上有组织的南美”。在中亚,上海合作组织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2017年和2023年,上海合作组织先后两次扩员,接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为成员国,正式成员从6个增加到9个,还吸纳阿富汗、白俄罗斯、蒙古作为观察员国,使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和地区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为地区合作与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在亚太,区域

内的经济一体化并未因大国博弈退化,在部分地区反而得到加强。比如,NAFTA 经过重新谈判以美墨加协定(USMCA)的面目现身,TPP 在美国退出后仍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的名义得以推行。<sup>④</sup>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区,非盟、东盟都在积极推动地区内的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为各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可见,由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经停滞,而且也很难重新回到曾经的势头,区域秩序变得更加关键。未来国际秩序将会变得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sup>④</sup>

第三,在规范秩序方面,“全球南方”的兴起和分化加速了文化权威的衰落和国际规范秩序的松动,意识形态多元化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的多极化进程。

国际规范秩序的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使自由主义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sup>④</sup>自由主义倡导平等、自由、民主、公民权利、国际合作等价值观,在推动全球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因其遵循“普世价值”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一再引发国际关系紧张甚至冲突。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以来,美国极力将中美战略博弈推向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框架,将原本具有多维竞合空间的大国权势之争推向零和的意识形态之争,导致国际秩序阵营化加剧。各国围绕贸易、技术、政治制度的分歧,最终都指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野,使世界蒙上了新冷战的阴影。在大国意识形态竞争的滤镜下,西方社会普遍出现了国际秩序即将走向阵营化甚至两极对抗的预期。

“全球南方”对西方以意识形态划界,将国际秩序视为西方和东方、民主和威权之间的两极分化并不认同,相反,“全球南方”主张“去意识形态化”的国际秩序愿景,削弱了西方长期主导的规范秩序。在当前被大国战略竞争深度捆绑的国际秩序转型中,“全球南方”不愿意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极力避

免卷入意识形态之争,甚至成为缓冲大国竞争的新中间地带。对此,拉丁美洲《美洲季刊》编辑布莱恩·温特表示,拉美国家的“不结盟”植根于一种情绪,即如果战争蔓延到美国和中国发动的争夺全球影响力的战斗中,选择一方是没有好处的。“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大国冲突的新时代,大多数拉丁美洲政府更愿意袖手旁观。”“(因为)这些政府记得,冷战对他们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该地区曾被用作棋盘。”<sup>④</sup>2022年,印尼外长蕾特诺·马尔苏迪代表东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也明确表示,“我们拒绝成为新冷战的棋子,相反,我们积极推动与所有国家合作的模式。”<sup>④</sup>由此可见,南方国家拒绝按照西方的标准“选边站”,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做法极为反感。印度外长苏杰生甚至直接批评欧洲,称“世界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欧洲为中心”,“欧洲必须摆脱这样一种观念,即欧洲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但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sup>⑤</sup>

“全球南方”和西方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差异,反映出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秩序的松动,这种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将进一步加速国际秩序的多极化。2023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协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1%的俄罗斯人、61%的中国人、51%的土耳其人和48%的印度人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多极化或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来主导定义。而认同这一观点的受访者在美国、英国和欧盟国家分别仅占37%、29%和31%。<sup>④</sup>这显示出“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的愿景不仅出于战略考量,同时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全球南方”似乎对俄乌冲突持矛盾态度,那是因为他们对俄乌冲突危及的国际秩序持矛盾态度。<sup>⑤</sup>由此可见,西方至上的逻辑观念正朝着多元和谐共生理念转变,在反思和批判中迈向一个基于多元文化的复合世界秩序成为大势所趋。<sup>⑤</sup>

总之,“全球南方”的兴起和分化,正在全面加速国际权力秩序、制度秩序、规范秩序的重构。当然,

“全球南方”究竟能在塑造国际秩序转型方面发挥多大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从长时段来看,“全球南方”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广泛的南升北降之势能否持续,这是“全球南方”实现国际秩序愿景的前提。虽然西方绝对霸权处于衰弱之中,但就全球金融、经济、军事实力而言,以及对未来技术创新前沿的控制,西方的主导性依然强大。仅仅基于“全球南方”经济总量的上升断言西方整体性衰落则尚待观察。<sup>⑤</sup>从短期来看,“全球南方”作用大小取决于能否保持自身的一致性和自觉性,抵制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倾向,引导国际议程设置专注于发展议题,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当然,如果西方国家认识到,以意识形态划界虽然能够加强西方内部的团结,却无益于增加西方之外的世界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认同,进而转向包容性的大国竞争框架,则能加速“全球南方”国际秩序愿景的到来。

#### 四、“全球南方”与中国的选择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多,如何从波诡云谲的表象中发现本质,认清世界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是中国理清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在世界秩序不确定性显著加大之时,梳理“全球南方”的兴起历程,观察“全球南方”的分化现状,研判“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的潜在影响,对中国把握和顺应百年变局下的世界发展大势、探讨自身发挥作用的空间、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首先,“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分化,为中国准确定位自身的历史方位和世界角色提供了参照。中国明确自身为“全球南方”的一员,这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对自身国际身份的新的清晰定位。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的国际身份和角色饱受关注也备受争议。尽管中国始终强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政治身份定位,明确表示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但质疑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特别是2023年3月和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对国际组织施压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在美国的蛊惑下,英国、加拿大等32个国家陆续取消对华普惠制关税。美西方的攻击削弱了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使中国的国际身份塑造受到干扰。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作为一种结构性身份标签的出现,成为透视中国国际身份的棱镜,也为中国更清晰地向国际社会阐释自身的身份定位提供了契机。2023年7月,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上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南方阵营的当然成员”,<sup>⑥</sup>肯定了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同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sup>⑦</sup>向世界宣告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定位和利益诉求。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不仅具有历史基础,也具有现实依据和未来期待。回溯历史,中国与“全球南方”曾面临相同的历史际遇,肩负着反抗西方殖民压迫、实现民族解放与政治独立的沉重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并致力于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提出了得到世界广泛认可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了南南关系、南北关系的良好发展。从当下境遇来看,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一样,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面临许多挑战。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创新能力、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与南方国家共同面临的任务。从国际秩序愿景看,中国与“全球南方”一道反对国际秩序阵营化、对抗化,是世界多极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推动者。

习近平强调,“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sup>⑤</sup>“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sup>⑥</sup>总之,无论是相同的历史遭遇与奋斗历程,还是共同的发展难题和目标任务,或是相近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期许,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都存在天然的情感纽带和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作为“全球南方”成员的立场定位具有清晰的事实依据和明确的国际共识。<sup>⑦</sup>

其次,“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分化,为中国找准自身在国际秩序转型中可发挥作用的空间提供了参照。中国不仅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更是“全球南方”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这一地位赋予中国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合作与治理方面独特的角色和责任。中国应在推动“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全球南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开放包容的国际秩序。

第一,支持和引导南方国家的知识资源生产,着力为“全球南方”提供知识资源公共产品。参与“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本质上是针对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平等的现实状态,从理论层面对发展、发展权、发展观等问题作出解答。<sup>⑧</sup>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垄断了现代化知识资源的定义权,使得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被迫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和标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科技,通过改革开放、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式,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垄断,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理念重建、发展模式选择与发展合作方式拓展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参考力量。<sup>⑨</sup>同时,许多南方国家在自身发

展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待总结升华为真知灼见,为探索适合各自国情和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基础。

对此,中国应主动担当全球知识资源引擎的角色,推动“全球南方”加强团结与互学互鉴,将发展经验转化为发展知识资源,为“全球南方”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好指引。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平台建设,借助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国际发展知识经验交流平台,为各国提供分享发展经验、交流发展理念、探讨发展合作的平台。二是加强知识资源供给,通过发布《全球发展报告》、设立发展基金等形式,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促进全球发展合作知识传播,为各国提供发展资源和智力支持,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创新和进步。此外,中国可借鉴2017年和2023年先后两次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2019年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经验,与“全球南方”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探索更加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总之,知识资源生产不仅是支持“全球南方”持续发展的内核力量,也是推动世界秩序向多极化过渡的内在支撑,是中国在推动南南合作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领域。

第二,坚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促进“全球南方”合作机制高质量发展。前文述及,“全球南方”相较于西方国家面临更大的脆弱性,国家的核心诉求是共谋发展。而要想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合作机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合作机制促进南方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和资源互补,提升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才能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争取更多资源和支持。近年来,77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为“全球南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应持续推动这些合作机制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开放的姿态,推动“全球南方”合作机制进一步提质扩员。随着“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

作用日益凸显,提质扩员是适应这一变化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多极化、民主化的全球治理格局,使“全球南方”更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决策。2023年8月,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中国积极支持金砖合作机制从“金砖五国”扩员为“金砖十一国”,进一步拓展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空间,使金砖机制具有更强的代表性。二是拓展合作领域。随着成员增多,拓展合作领域是多边合作机制发展的必然演进规律。跨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拓展将进一步强化多边合作机制的影响力,共同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促进多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不仅有益于“全球南方”自身的利益,也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更多活力与稳定性。三是加强机制内外沟通,与其他国际组织协同合作。积极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有助于传递机制声音,推动共同关心的议题,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实现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第三,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为“全球南方”提供实质性支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中国具有显著的资源 and 资金优势。近年来,中国始终将南南合作作为对外合作的优先方向,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引领全球发展合作,许多资源投入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与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达到2万亿美元、1.3万亿美元。<sup>⑤</sup>自2021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并于2022年1月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70

多个国家加入。2022年9月,“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发布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50个务实合作项目清单,涉及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多个领域,其中10多个项目已经落实,剩余项目正积极推进。目前,项目库务实合作项目总数已突破100个,近40个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sup>⑥</sup>由此可见,与部分西方国家将“全球南方”视作战略资源工具、极力构建“小圈子”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切实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发展,推动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建设。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绝不是为了与西方对抗,而是旨在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全球均衡、包容性发展,最终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目标。作为一个从贫穷和落后中崛起的大国,中国深刻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同时也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展现出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特点。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南北合作中能够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南南合作中,中国能与南方国家分享自身的发展经验,提供援助和支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南北合作中,中国能够平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推动双方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种双重的角色和立场,是中国对全球共同发展的坚定承诺和 大国担当的有力支撑。

### 结语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博弈在全领域、以全手段展开,“大国战略竞争”成为解释这个动荡变革世界的主流叙事框架。在这种竞争与对抗的思维下,世界似乎陷入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叠加的恶性循环和悲观预期。在百年变局持续演化的当下,“全球南方”作为一支具有全球影响的政治力量出现,为我们认知这个世界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提供了一面新的棱镜。“全球南方”涵盖了世界大多数国家,使这一群体多元、松散,但也正是如此,这个群体所凝聚

的共识和发出的声音对我们认清历史发展大势、把握时代潮流更具启示意义。“全球南方”兴起的历史、日渐分化的现状和对国际秩序的愿景提示我们，和平与发展仍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诉求，贫困、不平等、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和技术落后仍在困扰着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挑动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渲染大国竞争和分裂，只能加剧紧张局势、破坏国际合作与稳定，对全球和平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全球南方”的兴起也为中国重新思考自身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以“全球南方”为参照，共同的历史经历、发展任务和国际秩序愿景，不仅使中国和国际社会再次确认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一员、“全球南方”一员的身份定位，也再次证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和实践顺应历史大势、符合时代潮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中国进一步促进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提供了方向指引。未来中国将继续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顺应国际社会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期待，促进世界的繁荣和进步。

#### 注释：

① Ravi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2,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2/global-south-geopolitics-economics-climate/>.

② "Policy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umio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SAIS)",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Japan, January 13, 2023, [https://japan.kantei.go.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301/\\_00005.html](https://japan.kantei.go.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301/_00005.html).

③ 《习近平向第37届非洲联盟峰会致贺电》，《人民日报》，2024年2月18日，第1版。

④ Tobias Bunde, Sophie Eisentraut and Leonard Schütte, eds.,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4: Lose-Los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2024, <https://doi.org/10.47342/BMQK9457>.

⑤ 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外交部网站，2023年7月26日，<https://www.mfa.gov.cn/wjbzhhd/>

202307/t20230726\_11117824.shtml。

⑥ 《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6页。

⑦ Stewart Patrick and Alexandra Huggins, "The Term 'Global South' Is Surging. It Should Be Retired."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15, 20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3/08/15/term-global-south-is-surging-it-should-be-retired-pub-90376>.

⑧ 殷之光：《“全球南方”与新型全球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

⑨ 陈其人：《南北经济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页。

⑩ 同上书，第1页。

⑪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MIT, 1980;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Common Crisis North-South: Co-operation for World Recovery*, Pan Books, 1983.

⑫ 张云：《从“发展中国家”到“全球南方”国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19日。

⑬ 颜声毅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⑭ 赵可金：《百年变局中的“全球南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

⑮ Heike Pagel, Karen Ranke, Fabian Hempel and Jonas Köhler, "The Use of the Concept 'Global South' in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Academia*, July 11, 2014, [https://www.academia.edu/7917466/The\\_Use\\_of\\_the\\_Concept\\_Global\\_South\\_in\\_Social\\_Science\\_and\\_Humanities](https://www.academia.edu/7917466/The_Use_of_the_Concept_Global_South_in_Social_Science_and_Humanities).

⑯ Sebastian Haug, Jacqueline Braveboy-Wagner and Günther Maihol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2, No. 9, 2021, pp. 1923-1944.

⑰ Jonathan Rigg, *An Everyday Geography of the Global South*, Routledge, 2007, p. 3.

⑱ Forging a Global South,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s, December 19, 2004.

⑲ Deepak Nayyar, "The South in the World Econom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3,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hdro1301nayar.pdf>.

②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IMF,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PPSH@WEO/MAE>.

③ Ibid.

④ Graham Allison and Eric Schmidt, "China's 5G Soars over Americ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6,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5g-america-streaming-speed-midb-and-investment-innovation-competition-act-semiconductor-bio-tech-ai-11645046867>; Jeff Mason and Michael Martina, "U. S. Warned Brazil That Huawei Would Leave It 'High and Dry' on 5G", *Reuters*, August 9, 2021,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us-warned-brazil-about-chinas-huawei-5g-network-white-house-official-2021-08-09/>; Benjamin Herscovitch, Dirk van der Kley and Gatra Priyandita, "Why Indonesia Has Embraced Huawei", *Foreign Policy*, July 28,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28/indonesia-china-huawei-techcybersecurity/>.

⑤ 伊萨·施瓦基:《“全球南方”中的非洲出路何在——万隆会议和泛非主义的教训》,曲云英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6年第4期。

⑥ 张云:《从“发展中国家”到“全球南方”国家》。

⑦ Nicholas Lees, "The Brandt Line after Forty Years: The More North-South Relation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7, No. 1, 2021, pp. 85-106.

⑧ UNDP,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23*, July 2023,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hdp-document/2023mpireportenpdf.pdf>.

⑨ World Bank Group,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24,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7fe97e0a-52c5-4655-9207-c176eb9fb66a/content>.

⑩《技术和创新报告202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网站,2023年3月,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ir2023overview\\_ch.pdf](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ir2023overview_ch.pdf)。

⑪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s and Figures 2023, The UN Specialized Agency for ICT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https://www.itu.int/hub/publication/d-ind-ict\\_mdd-2023-1/](https://www.itu.int/hub/publication/d-ind-ict_mdd-2023-1/).

⑫《全球数字契约——为所有人创造开放、自由、安全的数字未来》,联合国网站,2023年5月,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our-common-agenda-policy-brief-gobal-digi-compact-zh.pdf>。

⑬ "Text of PM's Remarks at Opening Session of 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 2023",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ndia, January 12, 2023, [https://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remarks-at-opening-session-of-voice-of-global-south-summit-2023/](https://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remarks-at-opening-session-of-voice-of-global-south-summit-2023/).

⑭ Tobias Bunde, Sophie Eisentraut and Natalie Knapp et al.,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3: Re: vision*,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2023, [https://d3mbhodo116ikf.cloudfront.net/2023/Munich%20Security%20Report%202023/MunichSecurityReport2023\\_Re\\_vision.pdf](https://d3mbhodo116ikf.cloudfront.net/2023/Munich%20Security%20Report%202023/MunichSecurityReport2023_Re_vision.pdf).

⑮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Report 2023*, December 2023,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83f7aadd-dc5a-406b-98d4-9624e93993e5/content>.

⑯ FAO, IFAD, UNICEF, WFP and WHO,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3*, 2023, <https://www.fao.org/3/cc3017en/cc3017en.pdf>.

⑰《联合国持续提供支持,帮助巴基斯坦应对洪灾》,联合国网站,2023年3月8日,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03/1115922>。

⑱ 李聆群:《“全球南方”在国际海洋治理中的角色——以〈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谈判为例》,《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6期。

⑲ Sebastian Haug, Jacqueline Braveboy-Wagner and Günter her Maihol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pp. 1923-1944.

⑳ James Jay Carafano, "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Global South", August 3, 2023, <https://www.gisreportsonline.com/tr/global-south-united-states/>.

㉑ 郭言:《警惕“全球南方”概念被曲解利用》,《经济日报》,2023年9月4日。

㉒ Carlos Pereira and João Augusto de Castro Neves "Brazil and China: South-South Partnership or North-South Competi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2011,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03\\_brazil\\_china\\_pereira.pdf](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03_brazil_china_pereira.pdf).

④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

④2 Kai He and Huiyun Feng, "International Order Transition and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Indo 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6, No. 2, 2023, pp. 234-260.

④3 Olaf Scholz, "The Global Zeitenwende: 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 *Foreign Affairs*, Vol. 102, No. 1, January/February 2023.

④4 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1, 2024.

④5 "Policy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umio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SAIS)".

④6张宇燕:《全球化、区域化和平行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

④7唐世平:《国际秩序的未来》,《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

④8 Xuetong Yan, "Chinese Values vs. Liberalism: What Ideology Will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Normative Ord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1, No. 1, 2018, pp. 1-22.

④9 Joe Parkinson, David Luhnnow and Juan Forero, "Anti-Russia Alliance Is Missing a Big Bloc: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4,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anti-russia-alliance-is-missing-a-big-bloc-the-developing-world-11649950913>.

⑤0 Retno Lestari Priansari Marsudi, "Statement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t the General Debate of the 77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26 September 202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September 26, 2022, <https://kemlu.go.id/portal/en/read/4018/pidato/statement-by-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of-the-republic-of-indonesia-at-the-general-debate-of-the-77th-session-of-the-un-general-assembly-new-york-26-september-2022>.

⑤1 Sourav Roy Barman, "Europe Has to Grow Out of Mindset That Its Problems Are World's Problems: Jaishankar", *Indian Express*, June 4, 2022,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europe-has-to-grow-out-of-mindset-that-its-problems-are-worlds-problems-jaishankar-7951895/>.

⑤2 Timothy Garton Ash, Ivan Krastev and Mark Leonard, "Global Public Opinion One Year into Russia's War on Ukrain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2023, [https://ecfr.eu/wp-content/uploads/2023/02/United-West-divided-from-the-rest\\_Leonard-Garton-Ash-Krastev.pdf](https://ecfr.eu/wp-content/uploads/2023/02/United-West-divided-from-the-rest_Leonard-Garton-Ash-Krastev.pdf).

⑤3 Hal Brands, "The Global South Owes America Some Thanks",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3-04-27/the-global-south-owes-america-some-thanks>.

⑤4陈明琨:《百年大变局下世界权力的转移与国际秩序的复合型转向》,《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2期。

⑤5李小云、徐进:《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

⑤6《王毅出席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外交部网站,2023年7月10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307/t20230710\\_11111002.shtml](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307/t20230710_11111002.shtml)。

⑤7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应对风险挑战,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第2版。

⑤8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

⑤9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2版。

⑥0吴志成:《“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立场担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

⑥1殷之光:《“全球南方”与新型全球化》。

⑥2徐秀丽:《中国与“全球南方”发展合作的趋势与创新》,《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

⑥3《〈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3年10月,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htm)。

⑥4《全球发展倡议落实进展报告2023》,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网站,2023年6月, <https://www.cikd.org/detail?docId=1671665635072057346>。